



只有时间是忠诚的

——长篇小说《和平》后记

葛水平

编辑小爽说“写一篇《和平》(作家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后记吧”。

我在电脑前坐了很久,对于战争,一切既不可选择,也不可期待。因为,不断的重复已使许多人事不再被珍视。

时间没有刻度,没有痕迹。没有一个人是为战争而出生的。可战争把一切温暖的事物变得黑暗和悲伤。如果说现实社会中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个悲剧,那么战争中3500多万死亡者只是一个数字。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9500多万平民流离失所。庞大数字的震撼力永远建立在“一”的基础上,《和平》也是在一个中国人与一个日本人的基础上讲故事。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原型,起因是我婆婆家族的故事感染了我。婆婆的父亲是一名东北邮政工作者,九一八事变之后,奉天沦陷,但有骨气的奉天邮务管理局始终坚持中华邮政,拒绝与日本奉天邮局合作。因当时邮务长是意大利人,日本人也奈何不得,直至1932年伪满洲国已经被日本人扶持“壮大”,奉天邮务管理局全部职员撤入山海关内。

婆婆兄弟姊妹9个,5个参军。她的父亲一生留下大量的日记,每一本日记封皮的绸面上都绣着“一和平”二字,可惜后来日记在颠沛流离中遗失了。我在断断续续听婆婆讲这些故事时,不由得想为过去的岁月写一部小说,于是又开始查阅日军战犯战争结束后写下的战争回忆录。其实日本人对中国的窥探更早,从日本明治维新后就派特务进入中国手绘中国地图,为占领作准备。

了解愈深,战争中横冲直撞的恐惧、无辜生命凋零的悚然,便愈发沉甸甸地压在心头。时间或许风化记忆,可真正沉重顽强的过往,终究在时光里执拗地留存——只因那是历史中挥之不去的硝烟。

岁月从不等同于时间,前者是鲜活的过往,后者是冰冷的

刻度;时代也绝非历史的反义词,而是历史在当下的延续。

从大量的史料阅读中,我看见太多普通百姓并非漠然世事,只是被恐惧裹挟;比起在绝境中挣扎求生的能力,他们甚至连预判战争降临的力量,都显得格外微弱。贫穷的日子像春雪般易逝,从来留不住丝毫冷淡,而活下去的唯一方式,便是“迎接”——像迎接每一个明天到来那样,接纳眼前的苦难。

为生存倾注热情,是刻在人性里的本能。人生的行迹就像黄河水奔泻千里,决之东则东,决之西则西。劫难随岁月步步紧逼,对本就挣扎求生的人而言,又何谈觉醒?

人间众生相万千,我落笔写他们时,只愿从人物本性出发。写作者的情感终有限度,而这限度,说到底就是爱的能力的限度。我爱着笔下每一个角色——只因为,他们都活在那样艰难战争年代里。

创作途中曾两度停滞。初动笔时的满腔壮志,在写到十万字、触及战争题材时骤然碰壁——我的知识储备清晰地告诉我,自己正踏入一片全然陌生的领域。可开弓哪有回头箭?独自痛哭一场后,我终究选择迎难而上。第二次卡顿,是因一块深埋地下的石碑。碑上“我死国活”四字,瞬间击中人心。只是,被感动是一回事,要将这份震颤妥帖地转化为文字,又是另一重艰难的考验。

时间被战争彻底填满。它时而模糊得没了轮廓,时而又鲜明得烙进骨髓。而在这长河里反复更迭的,始终是人间悲喜与聚散。

《和平》中的钟表是时间的具象化,它寓意着时间作为第四维度的存在——每秒跳动的格数,永远均匀的节奏,都在丈量着不可逆转的进程。可在这规整的时速里,有多少人悄

然消失?他们来过这世间,却从未尝过好日子的滋味。

时间又像从久远记忆里走出的影子,轮廓模糊,却带着撼动人心的巨大重量。而人的一生里,唯一能标注时间的只有钟表,可在它冰冷的刻度面前,人类的挣扎与悲欢,终究是徒劳。

人间烟火如一根细密的针,串联起时代的肌理。在《和平》中,我只想借民间那些鲜活有趣的现象,让读者触碰到那个时代的面容与神情。

陈年往事与前尘旧梦,宛如一条流动不居却澄澈明净的河——它承载着小说人物的生命历程与心路轨迹,亦是战争里卑微个体头顶那片难得的天光云影。

而在民间土壤里,随处可见的神秘细节,如同故事枝干上悬挂的细碎花叶,繁复却生动。我希望对这段过往既感兴趣又知之甚少的读者,能透过这些历史的细微表情与岁月深处的真切面容,读出那时的人间模样。

我在《和平》中写中国女性和日本女性,她们被战争伤害。我一直苦于难以从内心寻找到可以与战争年代相称的感情,她们身体中发生的任何奇妙变化,我必须符合人性不带任何情绪去写她们。当我们剥离战争的宏大叙事,回归个体本身,这些曾承受深重屈辱与牺牲的女性,也理应得到尊重——这份尊重,值得女性创作者用文字去珍视、去守护,为她们被忽略的苦难与尊严留下印记。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那一段并不遥远的过往:家国飘摇,山河遭难,而彼时黄土地上扎根生长的草木,恰似绝境中不屈的脊梁,以蓬勃的生命力昭示着民族的韧性。

面对任何国家的战争,我们都不应该轻慢了生命。让我们永远记住:这场战事,承接着往古,也指向了未来。



我为啥写十三根烟筒

张发



作者介绍:张发,曾任《黄河》杂志主编。代表作有短篇小说《有福老汉》《硬汉官志存》,《十三根烟筒》获2022—2024年度“赵树理文学奖”中篇小说类。

阳光从阔大的玻璃上照进来,窑洞里一片敞亮。窗台上摆着的几盆花草,枝叶舒展,生机盎然。陪同我来的山阴县下喇叭乡副乡长徐晓圆是这里的常客,又是我小说人物原型——口子梁村党支部书记彭云先进事迹报告团的成员。半年多来,他几乎成了陪访专业户。

“彭云啊,你死了咋还没完没了地欺负我,让我不能好活一天!你们这些记者啊,作家啊,要来,怎么就不能结伴一块儿来?你们来一拨,让我说一回,说一回,我就要哭一回。”梁月云说。

徐副乡长告诉我,前一段日子,朔州市电视台的记者来拍一个专题片,梁月云声音哽咽着一边哭一边说,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摄像师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一边操作机器一边也跟着哭,以致不得不好几次中断采访,停下来平复一下彼此的情绪。

梁月云老太太说,丈夫死了,她没有哭过,母亲死了,她也没有哭过。唯有这个彭云,走了快9个月了,说他一回,她就要哭一回。

梁月云从自己身边的几件事说起——得知梁月云的丈夫得的是治不好的病,不管多忙,彭云每天总要抽时间到家里看他一次,陪他拉拉家常说话,五年里从未间断。要是有一天他偶然没有来,丈夫自己就会说,彭云肯定是到城里开会或出门去了;如果得知彭云没有外出,但还没有到家里来,不管多晚,他都眼巴巴地等着,直到彭云忙完了他该忙的,哪怕是只说一句话就走了,他这才了却心事,合上眼睛去睡。

每逢刮霍乱子风,梁月云家灶里的煤烟不从烟囱里向外流,而是全从灶口上往外冒,乡亲们盘炕的高手根治了几回,就是不管用,这成了彭云的一块心病。每到冬天,隔几天他就要提醒梁月云一次:“嫂子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灶里的余火灭掉,冷就冷一点,有暖

乎乎的热炕睡,冻不死你。”

这几年,村子里只留下一些老弱病残,彭云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各家的烟囱是否冒烟了。我小说的题目定为《十三根烟囱》,即出于此。

因为要养3个孩子上学,彭云一家过着俭朴的生活,柜子是水泥打的,地板砖只铺了三眼窑洞中的两眼,电视机更是一个“挨打的货”,打开机子后,只有打它一巴掌,屏幕上的雪花点才会消失。每天吃过晚饭,梁月云就到彭云家串门去了。等待梁月云准时到来的不仅仅是彭云夫妻,还有灶膛里两颗将熟的山药蛋。每天晚饭后,彭云的妻子杨生桃趁着灶膛里还有余火,放进去7颗不大不小的山药蛋,3颗给彭云,自己和来串门的梁月云一人两颗,三个人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拉着家常,一边等着山药蛋烤熟;再到一边吃着烤熟的山药蛋,一边拉着家常。尤其是漫长的冬夜里,对梁月云这样一位孤身老太婆来说,有人以这样的方式陪着打发时间,该是一件多么舒心的事!

梁月云的记忆里,彭云一辈子没有穿过几件像样的衣服。他的球鞋常常是露脚趾头的,不知被人强行扔过多少回。我就要哭一回。他就会把鞋踢掉,将一只脚伸到你的面前来:“别看它前露肉,可也前后进风哩,一点都不臭,不信你闻闻。”吓得众姑娘笑着作鸟兽散。

彭云被救护车拉走了,口子梁男男女女的心全提到了嗓子眼,下午3点多的时候,救护车拉回来的却是他的遗体。天真的塌下来了,平时走路还算利索的王丙仁老汉,大声嘟囔着,几乎是爬着去往彭云的家里,嘴里翻来覆去一句话:“老天爷啊,你咋不让我死——老天爷啊,你咋不让我死——”

讲着这样的故事,梁月云怎么能够不悲情难抑、潸然泪下!我们这些来访者,又有谁听了会不情从中来、肃然致敬?

《十三根烟囱》最初是一个电影文学剧本,我当正剧写的。山西影视集团的老总看过之后,有意拍摄,根据我剧本里已有的情节,他希望我改成喜剧,并当下帮我设计了几个桥段。因为经过多次采访,彭云早活在我心中。要喜剧也可以啊,我不愁编出相应的故事,况且,生活中的彭云,原本就幽默风趣,一个长于活跃气氛和搞笑的人。

我相信我小说里的故事,就是彭云的故事,彭云的家人和朋友看了,不会觉得张冠李戴、不伦不类。一个天天早上查看烟囱的核心情节,可以让我联想到一切。

为山海风物歌唱

——从《万物走过时间》看别样生活

成向阳

春日上午,终于读完了《万物走过时间》(浙江摄影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这部散文集。作者陈晓晖是潮汕人,这部作品的价值在于以作家的眼光与深情,凝视、记录并重新阐释了北回归线以南的阳光经行万物与人心之后,留下的迷人光影与深远的爱。

《万物走过时间》首先是一部发掘潮汕地区风物特产的博物志,是二十四节气在山海之间热烈、喧闹、富有烟火气息的生命演义。在书中,陈晓晖像一位魔术师,挥舞着时间的魔棒,唤醒了这方天地之间、山海深处的万物。这些物,大至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小至一花一叶、虫鸟鱼虾。它们无论是有生命气息的动物植物,还是无生命气息的家用器物,抑或是如天光云影、蝉鸣鸟唱、草色花香,甚至是一阵吹过稻田的清风或一缕萤火的流光等无不从把握的虚幻之物,都能带给我美而丰饶的感受,牵扯起我心底隐藏的对生活平静而温柔的爱意。作为一本以二十四节气来结构篇章的散文集,本书最

大的特点在于作者并不空说节气,而是倾尽全力,以自己的地域文化生活体验去连接万物与时间。作者基于自身经验,在节气文化的语境与序列中对潮汕地区风物的观察、辨别、记录、描写与重新阐释,拓宽了“物”的意义边界,丰富了“物”的情感容量,重建了“物”的精神文化价值,真正让“万物”成为时间的容器与人类存在的佐证。

细心阅读本书,我们会发现作者总是能从某些与节气密切相关的具体之“物”起笔,写出人在时间中深切至于肺腑的体验。比如立夏时节从海上吹来的一阵暖风,吹开的那些富有潮汕地域特色的玉兰、金凤花、紫薇花、龙牙花、苦楝花……让作者想到的是时间河流中自己与亲人们的无数分身,以及人生关键时刻那些牵肠挂肚、刻骨铭心的体验。夏花作为节气中的寻常之物,于作者而言就像一个隐藏在时光深处的秘密档案馆,珍藏着自己与挚爱之人生命中不同的瞬间。在节气中闻着花香而来,便可以在与一朵花的对视中邂逅不同的自己,并让自己与“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无处不在的「赞美诗」

高晋旭

重读《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是在一个平淡无奇的傍晚。我在书桌一角温一壶茉莉花茶,等一朵茉莉在水里慢慢舒展开,茶香和烛火的暖意混在一起,像极了19世纪末欧·亨利笔下的一个个小人物的生活。

欧·亨利曾被誉为“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和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一起被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这位一生颠沛的作家,挨过失业的苦,熬过牢狱的孤寂,尝过丧妻的锥心之痛,在流亡中写下第一篇小小说。

读他的小说,总觉得他离我们很近。在他的笔下,活跃的永远是那些和他一样被命运的大手推着往前走却依旧守着真心的小人物。在《麦琪的礼物》中,黛拉剪掉视为珍宝的长发,就为了给丈夫吉姆的表配条表链。而吉姆一声不吭卖掉了祖传的金表,只想给妻子黛拉买心仪的发卡。两份礼物最后都成了用不上的“废物”。现在的人讲究仪式感,回头看看黛拉和吉姆吧,那份“想把最好的给你”的心意,那种不事张扬却无比真挚的爱,无疑是对生活最朴素的赞美。

在欧·亨利的小说里,一直脍炙人口的是他“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局,被称为“欧·亨利式结尾”。比如《最后一片常春藤叶》里,生病的乔希把命拴在了窗外藤叶上,觉得最后一片叶子落下时自己的生命也将结束。老画家比尔曼,是一个一辈子郁郁不得志、总念叨着要画一幅“杰作”的老人,当乔希望着那片“叶子”重新燃起生的勇气,要坐起来喝苏薇熬的鸡汤时,看着她渐渐好起来的苏薇告诉了她关于比尔曼先生的事。在暴风雨来临的夜晚,是比尔曼颤抖着爬上冰冷的墙壁,用他的生命,为乔希描绘了一片永恒不灭的常春藤叶。读者看到这里才猛然醒悟,原来所谓热爱生活,从来不是孤军奋战,有时不过是别人用善意为我们撑起一片天。

比尔曼的模样,就像欧·亨利的一生,平凡、落魄,甚至有些失意,后半生经历了逃亡、入狱,却始终蕴藏着一颗柔软的心,并且把这份富有真善美的心揉进小说里。其实,我们身边也有很多“比尔曼”:公交车上默默让出座位的乘客、救下轻生之人的外卖小哥、给环卫工人送一碗热汤的好心人、为身无分文的人送一碗热面的面馆老板,还有闹市一隅安静的读书角、店铺里小小的爱心驿站……这些都是现实版的“一片常春藤叶”,也是藏在生活里的赞美诗。

麦迪逊广场长凳上的流浪汉苏比,为了能在岛上的监狱里熬过寒冬,变着法儿惹事,在城市里溜弯作案,可警察对他视而不见。当他满怀失望地以为自己的过冬计划要泡汤时,他在一座古老教堂外的铁栏杆旁边,听到风琴师在键盘上反反复复练习星期天的赞美诗,内心受到触动。而他下定决心洗心革面、重新拥抱生活时,警察的手铐却“咔嚓”一下戴到了他的手腕上。这是《警察与赞美诗》里充满讽刺的结局,让人忍俊不禁,可笑过之后,心底却漫上一阵对苏比那份“想好好生活”心意的疼惜。

苏比的荒唐行径,背后是小人物在生存压力下的无奈与挣扎,而这也是欧·亨利亲身经历过的窘迫。他懂这些小人物的苦,也疼惜他们骨子里那份从未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才用幽默的笔调写苦难,用轻松的语调诉出心酸。真正的好文章从来不堆砌漂亮话,能戳中人心的永远是对人最深的理解和对生活踏实的爱。

欧·亨利走了百年,如今,我们依旧在生活里奔波,也许还会遇到寒风,会碰壁,会在得失间迷茫,就像他笔下的黛拉、比尔曼与苏比。不如稍微慢下来,停一停脚步,进入欧·亨利小说的世界,换一种角度看待遇到的人或事,便会发现那些藏在身边的真诚、善良与温暖,那些曾被忙碌忽略的细碎美好从未缺席。

愿我们从内心期待,把每一个今天过成属于自己的、小小的赞美诗。

经典漫谈 (94)



时间的风吹向广阔的山海,吹醒的不只是街头的花朵,还有田野深处无穷无尽的菜蔬与瓜果。陈晓晖在本书中的文学贡献之一,在于她总能借助富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民俗仪式,对微小平凡如菜蔬瓜果一般的“物”的认知意义和情感、文化容量进行拓展与扩充,使之在反常化、艺术化的过程中步入文学存在的行列。而作者对特殊民俗仪式和支撑它们的“物”的文学性体验,也进一步向读者袒露了她自己的情感历程和命运轨迹。这在本书中是一条隐性的但又因此必须被关注、被凸显的重要线索。

“努力有尊严地活着”,是书中深藏的呼号。而作者借一颗夏至后的西瓜和一个急切逃离的成人礼,以及立夏后夜半出海惊醒睡梦的红头船,哀而不伤地告诉读者,这种“有尊严地活着”的强烈精神需求究竟来自何处——它既来自自身悲惨的命运,同时也来自潮汕人在山海之间拼搏求活发展的精神传统。

正是有了对现世人情和族群精神的敏感体察与长久回味,万物在作者笔下才这样纷至沓来且样样鲜活、别致。它们非但没有外在于人而存在,还成为人进入时间的通道。正是在对万物深切地体验中,人得以深味自身的存在。所以,所谓“万物走过时间”,正是人的生命情感本身。由此,《万物走过时间》在《山海风物》的基础上,又是一部潮汕人在节气序列中借助万物体验生活的独特心灵史。它更像一个北回归线以南阳光下记录时间与生活的心灵标本,透过它,可以看到二十四节气文化广阔辽远、深厚绵密的“南方叙事”。

合理引用才能滋养创作

马忠

有肥肉,既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却以截然不同的对比与更凝练的语言,将对社会不公的批判推向极致,在已有文学范式中,通过精准的文字革新,实现意境的跃迁。

判断是抄袭还是引用(化用),不在“是否借用原句结构”,而在“是否完成创造性转化”。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往往是对前人智慧的创造性吸收、转化。钱锺书在《围城》中塑造方鸿渐这一“围城人”形象时,虽未直接引用古籍,却暗合《庄子·秋水》“夏虫不可语冰”的认知局限隐喻,将古典哲学思想融入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困境书写,让文字兼具思辨张力与文化底蕴。在学术领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引用晏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柳永“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辛弃疾“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三句宋词,并非简单挪用,而是以此为支点构建“人生三境界”的美学体系,赋予古典词句全新的哲学内涵与时代价值。这些引用之所以成为典范,在于引用者并非只是“拿来”,而是通过自身的观察、重构与升华,让前人的文字在新的语境中焕发新生,实现“借古人之语,写今人之心”的传承智慧。

从《诗经》“赋比兴”对上古歌谣的传承转化,到唐诗宋词对前人意象的化用出新,从五四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借鉴与本土化实践,到当代学术著作中规范的引文注释体系,引用始终是文化延续与创新的重要纽带。

杨本芬事件中引发争议的“袭用”,重点并非“使用了他人语句”,而是未注明来源、未进行任何加工转化,将他人的原创表达直接纳入自身作品。杨本芬的道歉展现了老作家面对失误的坦荡与敬畏,但“一句也不能用”的极端表态,显然混淆了引用与抄袭的边界。

在我看来,对于写作者与研究学者而言,正确的引用之道,至少应包含三重维度:其一,明确注明来源,无论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都需通过注释、参考文献等形式,尊重原作者的知识产权;其二,坚持创造性转化,引用并非简单复制,而是要结合自身创作主题与表达需求,对引用内容进行诠释、重构或升华,赋予其新的语境价值;其三,坚守适度性原则,让引用服务于原创表达,而非替代原创,始终保持自身的思考主体性与表达独特性。

写作与研究从来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古今中外的文字对话中寻找自我表达的坐标。杨本芬事件给我们启示:并非“拒绝一切引用”,而是学会在合理引用中汲取养分,在坚守边界中守护创作。

